

宋元谱录丛编 顾宏义 主编

宣和博古图

〔宋〕王黼 著

诸莉君 整理校点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 STORE PUBLISHING HOUSE

宋元谱录丛编

顾宏义 主编

宣和博古图

〔宋〕王黼 著

诸莉君 整理校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宣和博古图/(宋)王黼著;诸莉君整理校点.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2

(宋元谱录丛编/顾宏义主编)

ISBN 978-7-5458-1412-5

I. ①宣… II. ①王… ②诸… III. ①金石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K87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1787 号

责任编辑 顾 佳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宣和博古图

[宋]王黼 著

诸莉君 整理校点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mm 1/32

印 张 18.125

字 数 400,000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412-5/K·267

定 价 50.00 元

总序

何谓谱录？谱录就是依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撰成的书籍。^①《释名》释“谱”云：“布也，布列其事也。”又云：“谱，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说文》云“谱，籍录也”。而录即指按门别类、依一定次序记载相关人之言行或事物的书籍。因此，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谱录，乃与家族世系的记载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秘府藏书，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因为此类谱录著作的编纂特点，故后人也开始利用谱录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如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即通过排比《诗经》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的资料而撰成《诗谱》，用以显示其与时代政治、地域风土间的关系。于是后来就出现了单为记载经典所载物品的谱录，如三国吴陆玑撰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进而有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南朝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陈虞荔的《鼎录》等。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至此形成了一类以记物为主的书籍，专门记载某物或某一类物品的产地、形态、类别、特性、逸闻趣事及与之相关的诗文等，间附精美插图。至唐代

① 朱积孝：《谱录述略》，载《图书馆》1995年第6期。

陆羽撰成《茶经》三卷，“其书分十类，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其类十，其文实九也。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书，如司马相如《凡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亦旁资考辨之一端矣”。^①由此，此类饶有趣味的图书——谱录的体裁趋于成熟定型，而影响后世甚巨。

中国古代谱录发展至宋代，各种不同类型的谱录著述纷至沓来，卷帙繁复，蔚为大观：与农事有关的如曾安止的《禾谱》、僧赞宁的《笋谱》、范成大的《桂海果志》等，与日常饮食有关的如苏轼的《东坡酒经》、窦苹的《酒谱》、王灼的《糖霜谱》与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另有草木花卉谱如赵时庚的《金漳兰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胡元质的《牡丹谱》、陈思的《海棠谱》等，有鱼虫禽兽谱如傅肱的《蟹谱》、贾似道的《秋虫谱》、范成大的《桂海禽志》等，有文房四宝谱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欧阳修的《砚谱》、李孝美的《墨谱法式》等，有玉石古玩谱如杜绾的《云林石谱》等，有泉币鼎彝谱如董道《钱谱》、洪遵的《泉志》、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等。这一文化盛观的出现，与宋代文化尤其是与市民休闲娱乐文化的高度繁荣密切

^①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茶经》，中华书局影印本。

相关。

我国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其原因在唐、宋之际，随着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人对日常娱乐休闲生活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促进了城市娱乐休闲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使得娱乐休闲文化自贵族阶层整体下移至平民社会，从而构成了宋代文化大异于前代汉、唐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人撰写了多种专门记录与城市休闲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谱录类书籍。与前代谱录多与生产种植内容有关者不同，北宋时人撰写了数量颇众的园林花卉、文人清赏类谱录，前者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沈立《海棠记》等，而杜绾《云林石谱》、苏易简《文房四谱》等显然属于后者。发展至南宋，更出现了与市井娱乐文化密切相关的谱录，其中著名者似当属题名贾似道所撰的《秋虫谱》（也称《促织经》）了。

宋代斗蟋蟀之风甚盛行，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宋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所谓“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街坊中辟有专门的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由于玩者众多，所以城外农村里有专门捕捉、贩卖蟋蟀为生者，而城里也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闲汉”。贾似道为南宋末宰相，但也是一个著名的蟋蟀迷。据《宋史》载，当时蒙古铁骑大举围攻长江中游重

镇襄阳城，军情危急，但贾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与“博徒日至纵博”，甚至“与群妾踞地斗蟋蟀”，由此被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但他所撰的《秋虫谱》，分赋、形、色、养、斗、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论述，可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影响后世颇大。

撰成于南宋中晚期的《百宝总珍集》，也可算是一本奇书。《百宝总珍集》，据清代四库馆臣推测，大概为南宋都城临安城中从事古玩珍宝生意的商贾所编集，但其撰者已不可考。书中所载所记百数种珍宝玩器，每每详列其市场价格、真伪优劣、辨识手段等，并于每种器物前具载七言绝句一首，而行文多用市井口语、鉴宝行话，如卷一“青玉”条诗曰：“青玉从来分数等，滋媚润者彼人观。做造不论大与小，碾造仁相做钱看。”文云：“凡看玉亦有数等，上至不断青，下至碧绿色者，若颜色唧伶，样制、碾造、花样仁相，盏碗或腰条皮、束带、绦环零碎事件之属多着主。如绿色或夹石样范，花样不好，皆是猫货。已上数等皆是卖外路官员，此间少着主。”可见具有很高的古玩鉴定价值，也可由此一窥当时与古玩相关的各色人等以及市井口语、风俗等等。

承宋代余绪，元人所撰谱录虽然数量较少，但与宋代相比，其内容多关于器物及食谱，由此构成了元代谱录著述的一个特色。

随着谱录著述之种类、数量都较前激增，于是在宋代书目中开始设置谱录专类以收录此类文献。

宋代以前，谱录文献被附入别类之中，如《隋书·经籍志》将《竹谱》、《钱图》等归入“史部·谱系”类中，《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将《钱谱》、《相鹤经》、《鹰经》、《相马经》、《相贝经》等归入“子部·农家”类。直至南宋中期以前，仍无专类可归，如北宋《崇文总目》将《竹谱》、《笋谱》、《茶谱》、《花木录》、《钱谱》等归入“子部·小说”类，《相鹤经》、《鹰经》等归入“子部·艺术”类；而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录收入“食货”类，其“食货”类下分六小类，其中《钱谱》、《鼎录》、《刀剑录》、《锦谱》等归于“货宝”小类，《墨谱》、《砚录》、《文房四谱》与《香谱》等归于“器用”小类，《相鹤经》、《相马经》、《鹰经》、《禽经》等归于“豢养”小类，《竹谱》、《笋谱》、《荔枝谱》、《花谱》、《木谱》等归于“种艺”小类，而《茶谱》、《酒录》等则分别归于“茶”、“酒”两小类。南宋著名目录学家尤袤有鉴于此，遂在其所编撰的《遂初堂书目》“子部”之下专门设立了用来收录上述相关书籍的“谱录类”。

对于尤袤在四部分类中设置“谱录类”的原因，清代馆臣如此分析道：“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未载《竹谱》、《钱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鸞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

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所以在其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即沿用《遂初堂书目》“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①但因属初创，故而《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所收录的尚还混录有《侍儿小名录》、《警年录》之类当归入“传记类”的书籍，而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谱录类”则专门收载记物之谱录，并据图书的内容，还于其下分为“器物之属”、“食谱之属”与“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三小类。由此，谱录当以记物为主的定义方才正式定型。

因岁月久远，宋元时期的卷帙繁盛的谱录著述多有佚失，其具体数量今日已难以考述。今日可考录的宋元谱录，大致在120种上下，其中宋代谱录约100种。这流传于世的百余种宋元谱录，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其书完整保存至今的，如宋吕大临《考古图》、洪遵《泉志》、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元李衍《竹谱》等。二是其书通过《说郛》等丛书摘要载录才得以传诸后世的，如宋常懋《宣和石谱》、田锡《曲本草》、元宋伯仁《酒小史》等，已非完篇。三是从一书中抄录一篇别出而为单行本者，如宋初陶穀《清异录》本属杂采隋唐至五代典故的笔记著作，其中“茗荈门”被后人抄出单独成书，题名《荈茗录》，成为一本屡为后世引用的茶书。南宋著名文学家范成大撰有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序》。

《桂海虞衡志》，有志山、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诸篇，被后人分别抄出单行题《桂海酒志》、《桂海果志》、《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桂海虫鱼志》、《桂海禽志》、《桂海兽志》、《桂海香志》、《桂海器志》等；而元代费著的《笺纸谱》、《器物谱》、《蜀锦谱》、《钱币谱》、《楮币谱》等，也本为其所著的方志《成都志》中诸篇，但为时人所珍视，而抄录别行者。对此，本丛编皆视为单独著述，分别编录于各类之中。

从现存的宋元谱录情况看，其著者遍及社会各层面，其中姓名可考的，有贵为天子者（宋徽宗《大观茶论》），有官拜宰执大臣的（如苏易简、丁谓、欧阳修、周必大、贾似道等），有著名文人、书画家（如宋苏轼、米芾、洪迈、范成大、陆游，元倪瓒、杨维桢等），有隐士逸人（如林洪等），有僧侣（如释仲仁、僧赞宁等），另外有署名别号的，如题名审安老人者撰有《茶具图赞》、渔阳公撰《渔阳石谱》、鹿亭翁撰《兰易》等，或是因为此类谱录乃属“小道”，为免世人“玩物丧志”之讥而不愿题真实姓名者。但也有个别谱录的著者姓名原本失传不详，今所题姓名乃是后人在刻印书籍时所添加，其真伪于今日已不易探究，故本丛编一仍其旧。

本丛编所收录宋元诸谱录，大体先据其内容归入其类，同类者大体依据著者生卒年月为序编列（生卒年不详者，即以其主要活动年月为据编排）。每种谱录正文前，皆简述其撰者生平、谱录撰成年月及其主要内容、传世版本等情况；其篇末，

酌收有关序跋、题记等，以助于阅读。

本丛编所收录诸谱录，其底本一般择其精善且常见者，并酌校他本一、二种，但如其文字语义可两通者，即不予校改，而有明显舛误、脱漏、衍文者，则以圆括号“()”标示其为误字、衍文，而以方括号 “[]”标示其为正字、补字，但不另出校勘记。

又本丛编在编纂中，参考了不少前贤时哲的研究或校点整理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标示指出，故于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顾宏义

乙未五月于海上梦湖书屋

前言

在浩瀚的千年历史面前，我们都还太渺小。千年以前制造的青铜器，造型奇特，纹饰瑰丽，内涵宏大，夺人心目。这些流传至今的古代青铜瑰宝，绝不只是一件仅供博物馆收藏的珍贵艺术品，其价值要远远大于青铜器皿本身所能用数字衡量的市场价格。

从尊到彝，由鼎及簋，这些古代器皿的功用虽有祭祀、饮食甚至用来净手等的不同，但同样都是用来标榜自己贵族身份的象征。有时这些铜铁器具静默地服役着属于自己的责任，有时它们又骄傲地显示出一个个上古真迹。器皿上的拓片似胎记定义了它们的性格，又记录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史实。我们有兴趣地揭开了一片又一片的记录，品读着古人留给我们的、别具深意的谜题。

器物学之所以兴盛于宋代，要归功于当时文人墨客收集古器铭文的社会风气。宋仁宗时期，欧阳修等人开始收集铭文、碑刻，用以补充史料的不足，欧阳修在《集古录》中即揭示他研究金石的基本目的与路径。同时代的刘敞，除了铭辞文字以外，对古器物本身表现出莫大的兴趣。嘉祐八年（1063），刘敞将十一件带铭文款识的先秦古器，命工匠摹写，刻成石碑，完成了《先秦古器图》。在两位先驱的引导下，北宋哲宗时期出现

的两部《考古图》，以及随后成书的《宣和博古图》，显然都延续了欧阳修、刘敞的作风——考证铭文并加以用之。但注重铭文、纹样的研究胜过对器物本身的关注，却由此定型了两宋器物学的特征。

从大的背景来说，古器物学在宋代兴起还有一个原因，即在于“礼乐之学的复兴和儒家道统的重振”。民间的崇尚收藏之风流传至皇宫内院，而帝王的这种雅好，更是将这种收藏风尚推至极致，于是专门用来大量收藏三代鼎彝宝器的宣和殿，就赫然呈现在世人面前。此处需加说明的一点，这“宣和”并非年号，而是指北宋东京皇宫内的宣和殿。宋徽宗命人描摹图像，进行图录文献，将民间收集的古器物纳入宣和殿中，《宣和博古图》由此应运而生。这部很好地显示了宋代古器研究水平的著作，奠定了后代编制古器物图录、进行金石研究的基础，对古代艺术、宗教礼法、社会制度等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对于《宣和博古图》一书，在其作者、成书年代及其名字的由来等方面，还有着不小的争议。

首先，对于本书的著者，一说为王楚，一说为王黼。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为王楚撰，钱曾《读书敏求记》称王黼撰。此后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与清缪荃孙、吴昌绶《嘉业堂藏书志》等都认为是宋王黼等奉敕所撰。今有学者考证，王黼于宋徽宗时官拜宰相，封为楚国公，时人简称楚公，所以《郡斋读书志》中的“王楚”当为“王楚公”之误，脱了一个“公”字。

其次，对于本书撰作时代，一说成书于宣和年间，一说是大观初。说宣和年间者为钱曾，于其《读书敏求记》中称“《博古图》成于宣和年间”；说大观初者为蔡條，于其《铁围山丛谈》中提及，“此书踵李公麟而作，非踵黄伯思而作，且作于大观初，不作于宣和中”。因蔡條为宋徽宗时宰相蔡京之子，《铁围山丛谈》一书记载了从宋太祖建隆年间至宋高宗绍兴年间约二百年的朝廷掌故、宫闱秘闻、历史事件、人物轶事、诗词典故、文字书画、金石碑刻等诸多内容，皆为其所目睹耳闻，现代学者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对《铁围山丛谈》做了甚为详尽的考证，对其评价是“言之凿，足资参考”。因此，其记事内容颇可信从，即《宣和博古图》应为由徽宗藏书殿宣和殿而得名，与宣和年号无关。至于钱曾之说，据清代学者纪昀所考，大概出于误解洪迈《容斋随笔》“政和、宣和间，朝廷置书局以数十计，其荒陋而可笑莫若《博古图》”这段文字而造成，从而误断了《博古图》的成书年代。

《宣和博古图》全书三十卷，著录了宣和殿内由商至唐的青铜器共二十类八百三十九件，颇为全面地记录了宋徽宗时期宫中所收藏的自商至唐的各类铜器，其中不乏著名重器。全书著录顺序并非由年代编排，而是按器皿类型分类，并在器皿大类之下再按年代编排。其器皿类型分别为：鼎、尊、罍、彝、舟、卣、瓶、壶、爵、斚、觚、斗、卮、觶、角、杯、敦、豆、铺、甗、簠、簋、鬲、鍤、盃、盒、簠、甗、冰鉴、冰斗、盘、匱、洗、盆、鍤、杆、钟、磬、鐃、铎、铎、戚、杂器、

镜鉴等。其书卷一至卷五，收鼎一百二十六件；卷六至卷七，收尊彝四十一；卷八，收彝、舟二十七件；卷九至卷十一，收卣五十三件；卷十二至卷十三，收瓶、壶五十六件；卷十四，收爵三十五件；卷十五至卷十六上，收斝、觚、斗、卮、觶、角等六十四件；卷十六下至卷十七，收敦二十八器；卷十八，收簠、簋、豆、铺、甗、铉十五件；卷十九，收徽鬲、鍤、盃三十二件；卷二十至卷二十一，收盒、鐏斗、甗、罍、冰鉴、冰斗十四件，匱、匱盘、洗、盆、鍤杆二十八件；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五，收钟一百一十八器；卷二十六，收磬、鐃、铎、铎、铎、戚三十八件；卷二十七，收弩机、镞、钱、砚滴、承轅、輿轂饰、表座、刀笔、杖头四十件；卷二十八至卷三十，收镜鉴类器一百一十三件。

《宣和博古图》在李公麟的《考古图》和黄伯思的《博古图说》之后，建立了新的较为科学的编纂方式，来保留这些弥足珍贵的古器物原貌。其书中的每一类青铜器都撰有绪论，称“总说”，例如：鼎鼐总说、斝觚斗卮觶角总说、鬲鍤总说等。该书采用图文并录的方式，对于器物的描述基本保留原貌，并在图旁注有“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等标明图形比例。对器物本身的尺寸、重量、容量都一一详列，如卷二《周文王鼎》中所述：“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阔二寸，深五寸八分，口径长六寸一分，阔四寸三分，腹径长六寸三分，阔四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一十二斤三两。四足。铭七字。”著录工作之细致周详，着实令人佩服。除此之外，还为每一件器物考

证它的铭文、器名，部分器物并附上出土地点及其收藏家的姓名，如卷十四《商招父丁爵》中著录云：“其文曰‘父丁尊彝’，盖商人作礼器，多铭之彝，义取有常而无变也。是爵曰招者名，载其人为父丁而作也。”于是其立体而真实的图像绘制，精准的数据，为此后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文献依据，成为后世古器物学著录的一种基本模式。

《宣和博古图》因属为皇家之作，所著录的青铜器数量众多，所绘器图精益求精，著录体例又新颖完善，所以其质量远胜于之前的《考古图》等。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图其形制而记名物，录其款识。品有总说，以举其凡。而物物考订，则其目详焉。然亦不无牵合也。”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也评述说：“其书考证虽疏，而形模未失；音释虽谬，而字画俱存。读者尚可因其所绘，以识三代鼎彝之制，款识之文，以重为之核订。当时裒集之功亦不可没。”确实，本书在中国古器物编纂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宣和博古图》现存最早的是元刊本，藏上海博物馆，今《中华再造善本》据以摹真影印，题曰《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录》。此后，有明嘉靖刻本、明万历宝古堂刻本、泊如斋刻本、清亦政堂刻本、《四库全书》本等。本次整理以泊如斋刻本为底本，参校蒋珣翻刻本、《四库全书》本等。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1

宣和博古图卷一 1

鼎彝总说 1

鼎一 二十六器 3

商父乙鼎 商瞿父鼎 商子鼎 商庚鼎 商癸鼎 商乙毛鼎 商召夫鼎 商亚虎父丁鼎 商册命鼎 商父己鼎 商持刀父己鼎 商父癸鼎一 商父癸鼎二 商盂鼎 商秉仲鼎 商素腹宝鼎 商若癸鼎 商象形饔飧鼎 商鱼鼎 商伯申鼎 商立戈鼎 商立戈父甲鼎 商横戈父癸鼎 商綦鼎 商象形鼎 商公非鼎

宣和博古图卷二 24

鼎二 一十八器 24

周文王鼎 周晋姜鼎 周伯硕父鼎 周史頊鼎 周王伯鼎 周季嬭鼎 周中鼎 周南宫中鼎一 周南宫中鼎二 周南宫中鼎三 周穆公鼎 周象鼎 周父己鼎 周言肇鼎 周雒公絺鼎 周繇鼎 周单父乙鼎 周益鼎

宣和博古图卷三 39

鼎三 二十器 39

周叔液鼎 周单从鼎 周举鼎 周威君鼎 周鲜鼎 周伯郚父鼎 周节鼎 周仲偁父鼎 周太叔鼎 周齐莽史鼎 周乙公鼎 周嬭氏鼎 周奭父鼎 周龙生鼎 周丝驹父鼎 周丰鼎